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对竞技体育的影响

李宗山

(郑州师范学院 体育学院, 郑州 450044)

摘要:运用文献法和逻辑分析法,就春秋战国时期迅速崛起的“士”阶层对中国古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士”阶层作为社会精英群体,已经具备了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因素——自由身份、平等意识、尚武精神。但中国古代的竞技体育并没有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与“士”阶层的“工具化”和“精英品格的丧失”有关。从秦汉君主专制以来,“士”阶层逐渐消失在政府官僚之中,社会氛围和条件越来越不适合竞技体育的发展,古代竞技体育只能停留在贵族官僚们的娱乐游戏阶段。

关键词:“士”阶层; 竞技体育; 自由; 平等; 尚武

中图分类号: G80-0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596 (2015) 04-0094-03

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辉煌同处一个时期,曾在“士”阶层中出现类似古希腊民族“崇尚平等”“尚武好斗”的精神风尚。李立研先生说:“中国文化,滥觞于商周,成型于春秋战国。作为中国文化之一的中国体育,亦复如此。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它与同时期希腊的鼎盛时期——即罗素说的‘突然崛起时期’,一同构成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马克斯·韦伯语),对世界产生着无比的巨大影响。”^[1]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已经成为推动先秦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具有的自由的身份、平等的意识、尚武的世风,与同时代的古希腊奥林匹克“自由、平等”的精神有相同之处,应该说“士”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古代竞技体育发展提供了良机。

1 “士”阶层的崛起为中国古代竞技体育提供了发展的机会

1.1 “士”阶层的演变

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士”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处于统治阶级最底层。西周实行分封制,周王为天子,是最高统治者,天子以下为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组成的统治阶级,庶人分为农、工、商。顾颉刚先生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2]“士”作为统治阶级地位不高,属于低级贵族,拥有一定的土地和奴隶,正所谓“士无田不祭”和“士无土不君”。“士”介于“大夫”和“庶人”之间,担任各种低级官吏,身份比较固定,顾炎武也在《日知录》讲到“士大抵皆有职之人”。西周末年,礼崩乐坏,诸侯林立,作为统治阶级最底层的“士”人逐渐失去土地和

社会地位,“士”人作为统治阶级的等级概念已经名存实亡了,“士”阶层开始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春秋战国时期战火纷飞,整军备战自然就成为各个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如《左传》所记载“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祀”是指宗教祭祀活动,由巫师来完成;“戎”就是训练军队进行战争,主要由有军事才能的“士”阶层来承担。春秋战国时期阶级流动频繁,很多高级贵族失去土地下降为“士”,庶民通过军功上升为“士”。由于连年战争,各国都需要大量武士,他们聚集在都城和军事要塞,此时“士”阶层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正式出现,也为中国古代竞技体育的萌芽提供了土壤。

1.2 “士”阶层的自由身份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已经不同于西周时期的“士”,他们没有土地、奴隶等私有财产,主要靠自身专业技能谋生,这时的“士”阶层有其人身自由,可以自由投靠自己想去国家和贵族,并为之效力。在《论衡·效力》中就有“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的记载,说明当时“士”阶层的流动是自由的,所以就有了“朝秦暮楚”“晋才楚用”的说法了,更有“历九州而相其君”的事实了,充分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士”的身份自由。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了统一、扩大地盘,厉兵秣马,发动战争。《战国策·秦策》记载“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充分说明战争促使“士”人才的竞争,导致当时各国大兴“养士之风”。历史上的“战国四公子”最为著名,他们礼贤下士、倾尽家产、以诚相求招揽天下“士”人,其中孟尝君尤为突出。当时的贵族以养“士”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威望,而“士”往往会回报知遇之恩,为贵族们卖力,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才竞争,极大促进

收稿日期: 2015-04-02

作者简介: 李宗山(1974—),男,河南遂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及民俗体育。

了这一时期的人才流动,使当时社会民主气氛比较活跃,也使“士”阶层的身份更加自由。

1.3 “士”阶层的平等意识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阶层发生剧烈变化,原本的贵族大夫衰颓沦为“士”人。原为贵族特权的文化也随着身份的降低得到继承。同时作为文化继承者的“士”阶层与统治阶级也不再密不可分,这也促使“士”阶层独立人格的形成,其平等意识也逐步得到显现。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为界,“士”的服务方式可以分“一客多主”和“多客一主”两种模式,春秋战国时期是“一客多主”的模式,“士”可以在各国之间任意流动,一国得不到重用,可以选择到另一国去,也就是所谓的“良禽择木而栖”,此“士”为天下游士。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列举了秦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被李斯称之为“客卿”的士人对秦国由弱变强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人才的重要性,由此“士”人与君主具有了平等对话的资格。在《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中就有“孟子称病不肯先去朝谒齐王”的叙述,更有颜闾上殿不肯趋前而敢于对忿然作色的齐王直言“士贵耳,王者不贵!”的记载(《战国策》卷十一)。在西周宗法礼制土崩瓦解后,作为新兴的“士”阶层追求新型平等之礼,应是时代给予他们的殊荣。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士”不但要求有丰厚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人成为精神上的知己,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将君臣关系完全定义在平等对应的互动关系,由此也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平等意识已经成为普遍的意识了。

1.4 “士”阶层的尚武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不绝,各国为了开疆扩土,保卫自己的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军事武装力量,促进“士”阶层习武之风更加浓厚。军事的需要使社会中滋生了雄壮的“武风”,以致后来就出现“四时讲武,三年大习”的尚武世风。这时的中国在“尚武”方面,丝毫不差于最重“武化”的希腊城邦斯巴达。学校教育中更是武风大振,那时的老师就是中国“士”之最早代表,很多都是著名的武斗教师和战争专家。这种“士”,人们都称作“夫子”。“夫子”就是从“千夫长”“百夫长”的军官称谓中演化而来的。可见战争和武斗在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其实,尚武之风在春秋时期已经盛行,表现在军事、墓葬、法律、教育、官制、礼仪、婚姻等许多领域,极为频繁的弑君现象及一批勇武轻死的义士刺客的涌现,是春秋时代崇尚武功的重要标志^[1]。随着战国七雄之间不断混战,造成“士”阶层武风大振,“由于武风四起,于是‘好剑之风’也遂成时尚”^[3]。比如春秋时期的滕国国君曾自语“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4],而莒国国君则“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5],韩非子还记载“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6]等等。另外在“士”阶层还盛行佩剑、赠剑的风尚。春秋战国时期的“剑兴”反映了士人对雄性生命力的信仰和

崇拜,体现着一种彪悍、尚武的精神,这也是竞技体育的灵魂所在,也应是春秋战国时期竞技体育的根。

2 “士”阶层的衰落使竞技体育的萌芽枯萎

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身份自由、平等意识和尚武精神给其提供了发挥才智和忠勇的绝佳土壤,也成就了“士”阶层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这似乎也给中国古代竞技体育提供了大发展的机遇。然而,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竞技体育特征的“击技”“竞技”“比武”和“赛会”等最终还是没有发展成为专门的竞技体育。春秋战国时期的竞技体育萌芽没有发展壮大,有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士”阶层的工具化演变、竞技品格丧失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2.1 “士”阶层的工具化演变

春秋战国是周朝皇权没落、各列国争做天子的时期,虽然等级制度有所变化,但总的等级制度没有改变,“士”阶层依然是“无田”“无土”“不祭”“不君”的介于贵族与庶民之间的“游民”,不同于古希腊的“骑士”,有自己的土地和奴隶,是独立自由的贵族。无论武士(聂政、荆轲、侯嬴、吴起、庞涓、朱亥等),还是文士(毛遂、苏秦、张仪、商鞅、吕不韦、李斯等),都是寄食于王公贵族门下或择主而事并位至将相的“门客”(也被称之为“食客”)。“士”阶层必须依附王公贵族才能生存,没有自己独立的自由。“士”阶层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功业,他们以投靠王公贵族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或者是实现自己人生理想,无形中“士”阶层已经将自己“工具化”了,和王公贵族之间形成豢养与被豢养的主奴关系。孔子虽被尊为圣人,但在当时忠于王命的文化环境下,他坦言自己“三日无君”便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士”的地位在屈原的《离骚》中描写最为清晰:“士”人如同美人,在当时君主制的社会里,女人再美丽、再有才也只不过是工具罢了。“士”人一贯追求的人生理想——“君臣平等”,正是“士”人最渴望,也是难以实现的。虽然“士”人身怀绝技、忠心事主,只能得到锦衣玉食,而难以有“君臣平等”“主仆平等”的机会,更没有资格去参加贵族们的竞技运动了。

2.2 “士”阶层的精英品格丧失

“士”从西周时期贵族的最低层沦落到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用于开疆扩土、维护王权的工具,是“士”阶层命运的一次决定性改变,士阶层的精英品格逐渐丧失。从春秋到战国后期,“士”阶层从追求理想、慷慨仗义到屈从现实、趋炎附势的方向转变。孔子作为“士”的代表,是“王道”的坚定拥护者,他曾经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7]他为实现自己的“王道”理想,带弟子周游于卫、曹、宋、陈、蔡等列国,却终生不得志。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战国“名士”苏秦对于自身处境的看法:“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8]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缺乏独立地位和完整的人格,为了生存

和实现自己所谓的理想,不遗余力地做好“门客”工作,其社会精英品格逐渐丧失殆尽。德国著名哲学家席勒讲到:“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的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很难想象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能作为完全意义的人进行竞技游戏。

春秋战国时期的体育始终没有脱离“军用”等实用目的,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所决定的,与士阶层关系不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动荡,虽然为“士”阶层的自由身份、平等意识和尚武精神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所有的活动都必须考虑其实用性,以有利于国家的稳定统一或开辟疆土。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竞技体育只能是实用的“比武竞技”,而无法形成类似古希腊的奥林匹克那样的运动会了。

3 结语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最自由的历史时期,当时“士”阶层是社会精英,他们具有开展竞技体育的“自由的身份、平等的意识、尚武的世风”等必要条件,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失去了经济的独立性,导致“士”阶层对王公贵族的依附性和人格欠缺。“士”阶层日益“工具化”,致使他们的精英品格逐渐丧失,这虽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竞技体育没有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也应作为影响因素之一。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朝以后,“士”阶层的生存面临严峻的考验。随着皇权专制不断强化,“士”阶层不但失去权利,甚至成为皇权重点打击的对象。西汉时期“武士”崇尚“任侠风气”,“以武犯禁”屡遭皇权镇压,

“士”阶层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特别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初年的尚武之风变成了“重文轻武”。“我们民族性由强悍而被软化,实际从东汉时期开始。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中,两汉时期那股强劲的任侠、崇侠之风在东汉已大为减弱,至少在上层社会是如此。”^[9]此后,古代中国彻底失去了发展竞技体育的社会环境,中国古代竞技体育也因此慢慢萎缩。

参考文献:

- [1] 李立研.“武化”与“文化”——中国体育的土壤特征与气候流变[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4,28(4):1-10.
- [2]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3]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4] 孟子[M]. 方勇,注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5] 赵生群.春秋左传新注[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 [6] 韩非子[M]. 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7] 刘宝楠.论语正义[M]. 高流水,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8] 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 [9] 叶茂盛.先秦“士”的流变与中国古代体育土壤的缺失[C]//第22届泛亚洲体育科学大会论文集,2011.

Impact of Ancient Scholar-officials Class on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LI Zong-sha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Sciences,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Abstract: By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impacts of the rapidly rising class of ancient scholar-officials on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It argues that the scholar-officials class, as a social elite group, has already had the factors for improving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liberty identity, awareness of equality, and admiration of military power. However, the competitive sports in ancient China was not as strong as that in the ancient Greek, which is partly due to the “instrumentalization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class” and the “loss of elite charact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in and Han monarchy, the scholar-officials class gradually disappeared, and the social surroundings were increasingly unfi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ompetitive sports, while the ancient competitive sports could only remain as the entertaining games for ancient aristocratic bureaucrats.

Key words: scholar-officials class; competitive sports; liberty; equality; admiration of military power